

DOI: 10.13484/j.cnki.ndxbzsb.20240201

明代阴山地区政治变动与移民农业开发

刘晓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明代是阴山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明初在阴山地区实行军事卫所制,设卫兴屯,成为明代内地民人进入阴山地区的重要端始。明中叶,山陕边民、边镇军卒与白莲教徒等内地民人不断进入阴山地区丰州滩等地进行农业垦殖,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发展。隆庆和议后,阴山地区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明代阴山地区政治变动所导致的人口迁移是农业开发的重要动力,因政治形势变化驱动的移民涌入进一步推动了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外来人口迁移规模扩大与阴山地区农业开发进程深化相互作用,为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阴山地区;人口迁移;农业开发;明代

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24)02-0005-07

阴山地区泛指阴山山脉及周围区域,其地理空间范围处于东经 106° — 116° ,北界大致为北纬 42° ,区域内分布有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鄂尔多斯高原、乌兰察布高原等地理单元。按今日内蒙古行政区划划分,其覆盖地域大致包括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及鄂尔多斯市北部等地区。明代是内蒙古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元朝对中原统治结束后,阴山地区因其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明蒙双方反复争夺、长期拉锯的地区。当前学术界关于明代阴山地区农业开发的专题性研究较少,笔者拟结合前人成果^①,以政治变动与移民迁入为视角,对明代阴山地区的农业发展进行探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明代阴山地区地理概况

阴山所处的内蒙古高原的形成可追溯至约1.3亿年前,古生代末期的华力西运动^②与中生代侏罗纪时期的燕山运动^③造成蒙古地槽隆起并奠定了高原地貌形态。在地质形成过程中,内蒙古高原的南部翘起,形成阴山山脉。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中部,西起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狼山,东至闪电河谷地(滦河),长约1200千米,由西至东依次由狼山、色儿腾山、乌拉山、大青山、大马群山构成。阴山南北分别是鄂尔多斯高原与蒙古高原,乌兰察布草原分布于阴山东段北麓,河套平原和土默特平原位于阴山中西部南缘。

阴山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沟谷山涧发育出昆都仑河、大黑河等河流并向南汇入沿阴山南麓流淌的黄河,此外亦有如岱海、哈素海等积水湖泊在此地零星分布。

自然气候方面,阴山所处地域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因距离海洋较远和周边地理单元阻隔等原因,阴山地区气候较干旱,春季多风,冬季寒冷。受地理位置与季风气候影响,阴山地区降水较少且分布不均,自然降雨时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夏季,空间分布上呈现由东到西减少趋势,降水年际变化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明清时期阴山地区气候与当代略有不同。1450—1890年期间全球气候相对寒冷,气温较现代低 1°C — 2°C 。在我国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明清小冰期”。受此影响,阴山地区也出现了低温期,冬、夏季降温均较明显,1620—1640年期间阴山地区初霜期较当代提前了30天以上^[1]。“明清时期明长城一线成了农牧业文化的分界线,其间农牧交错带曾反复推移。”^[2]气候暖期阴山大部分地区均适合农垦,冷期则主要在长城以南地区发展耕种生产。

阴山山脉是季风性气候区和非季风性气候区的分水岭,又因其处于黄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依托本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属于比较典型的宜耕宜牧地区,处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地区。阴山地区既有阴山南麓农业耕种区,又有阴山北缘草

收稿日期: 2023-10-23

作者简介: 刘晓东,男,内蒙古包头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原游牧区,周边地区依据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发展为农牧交错区。阴山地区内农耕区与游牧区既界限分明又耦合分布,成为传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缓冲带和多民族的聚集带。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使得阴山地区宜耕宜牧,明蒙双方围绕此地展开反复争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内地民人不断进入阴山地区生活,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开发。

二、明初明蒙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争夺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元政权北徙后仍自称“大元”或“大蒙古”。学术界一般将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即1368年元亡至1644年清军入关前后将近270年间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为主的蒙古史称为明代蒙古史^④。明代蒙古势力虽撤居漠北,但仍谋划恢复旧疆。当时阴山大部分地区处于明代蒙古势力控制之下。为完成统一和巩固边疆,明蒙双方在阴山地区进行了长期反复的争夺。

(一) 洪武前期明蒙双方对阴山地区的争夺

洪武前期明廷对明代蒙古残余势力采取全力清缴政策,多次组织军事行动,希图“永清沙漠”。洪武三年(1370年)经沈儿峪之战打败了扩廓帖木儿,“尽降其众”^{[3]24},乘胜“逐北至察罕脑儿,擒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余万”^{[3]3753}。此战后,屯居于阴山地区的扩廓帖木儿进一步北走,退出长城以南地区,明廷控制了阴山南麓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曾下令免除丰州、东胜州的租赋,“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府兴县以去年旱灾,诏免其田租”^{[4]卷60,洪武四年正月戊申}。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廷筹划北征,遣徐达、李文忠、冯胜等大将率师“三道并进,以清沙漠”^{[5]《故元遗兵》,133}。但在岭北之役中,明军损失惨重,朱元璋调整对蒙政策,由全面清缴转变为积极防御,北部边防内收。

此后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反复争夺,形成此退彼进、彼进此退的局面。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4]卷85,洪武六年九月丙子}。阴山南麓的丰州、云内等地民人在洪武六年奉旨徙出后,该地为明代蒙古占据,且人数不少。《洪武本纪》记载:“(洪

武——笔者注)六年十一月壬子,扩廓帖木儿犯大同。”^{[3]28}这可侧证大同北边的阴山地区实为明代蒙古所据。洪武七年(1374年),“五月辛未,大同都卫遣兵出丰州、云内等处,捕获鞑靼六百九十五户,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八月丙辰,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师至丰州,分道追击胡兵,擒其故官十二人,俘虏其众二百二十人,并获马驼牛羊甚众”^{[4]卷89,洪武七年五月辛未;卷92,洪武七年八月丙辰}。此时活跃在阴山南麓丰州、云内等处的民众应该以蒙古人为主。从“捕获鞑靼六百九十五户,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的记载推断,在当地长期固定生活的蒙古人应当不少,查获“马驼牛羊甚众”也可见蒙古人在此蕃息日久,生活生产已有一定规模。明代蒙古与明廷围绕阴山地区的争夺战争时断时续,此地实际控制权也时常变更。

(二) 洪武后期明廷对阴山地区的经营

朱元璋认为,“胡虏余孽未尽殄灭,终为边患……肃清沙漠,在此一举”^{[4]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丁未},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派蓝玉率兵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贝尔湖)大败明代蒙古军主力,“其部属皆奔散,元裔日微”^{[5]《故元遗兵》,145}。此后,明朝在阴山地区统治渐趋稳定。明初,朝廷控制阴山地区后所建立的重要军事行政建制就是设立卫所。兴和千户所(在今河北省张北县),隶属北平都司,管辖阴山东部地区;东胜诸卫隶属山西行都司,统辖阴山以南地区;宁夏诸卫隶属陕西都司,辖境包含阴山西部的河套部分地区;东胜、丰州地区所设置的羁縻卫所是为安置率众内附的蒙古贵族而设,主要包含忙忽军民千户所、官山卫与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斤、瓮吉刺五千户所^{[3]974},分别隶属绥德卫、东胜卫和大同都卫。随着边疆局势的稳定,明廷在阴山地区置卫兴屯,移民垦荒,是明代阴山地区内地人口移入的重要端始。为加强边禁管理,明初所修《大明律》规定:“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把守之人,知而故放者,同罪。”^[6]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谕令:“守御边塞官军,不得与外夷交通。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及私事依者,全家坐罪。”^[7]稳定社会秩序后,明廷以屯田的形式在当地恢复农业生产,《明史·太祖本纪》也载:“洪武二十五年,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3]51}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元末战争后有所恢复。

阴山地区在明朝北部边防中的地位是随着明

蒙对抗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明初以驻守边关和沿要塞建立卫所为主要形式,建立以单个驻守点为军事依托的初级守备形态。自永乐开始,随着明蒙对峙局面的形成,明朝防区逐渐收缩到洪武初期固守的诸关隘内,并修建了自山海关至甘肃嘉峪关的明代长城,北方军事界限更加清晰,阴山地区也成为重要的地区性边防地带和明蒙争夺的军事缓冲地区。明初明蒙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争夺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明初阴山地区的频繁战争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明蒙双方在此地反复割据,影响了阴山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明代蒙古也因战争消耗,蕃息不易,多率部游牧北走。另一方面,明初,朝廷在控制阴山地区后设卫兴屯,垦荒生产,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明代阴山地区内地人口的移入和生产发展。永乐以后,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向内收缩,阴山地区的卫所多内撤废止,蒙古军又南下进入阴山地区活动。

三、明中叶北方边政败坏与民众迁移

明初,依恃强盛国力,朝廷对北部地区的统辖控制较稳定,而仁宗、宣宗以后国力日渐衰弱,北疆危机日益严重。成化年间,达延汗崛起并重新统一明代蒙古各部,实行分封并设立左右翼六万户。达延汗死后,各部又陷入分裂。明代蒙古各部势力不断发展并频繁进出明朝北疆,尤其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极大地打击了明朝北境的防御体系,成为明朝北部边防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嘉靖初,以阿拉坦汗为首的右翼蒙古最为强盛,不断向周边征战拓地,明蒙冲突日渐剧烈。明臣沈一贯感言:“终嘉靖之世,无一岁无虏患。”^[8]《请许套虏求款揭帖》,4764明代蒙古入掠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嘉靖时期商业上闭关拒贡与军事上消极防御策略使得蒙古人农产品与手工器具的日常需要无法得到稳定补充,“锅釜针线之具,缾絮米藁之用,咸仰给汉”^[9]《俺答列传下》,114。另一方面,明中叶北部边政败坏,北部镇卒边民饱经战乱,疲于守备应战。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二月,给事张尧年、御史王晰联合上疏表陈蒙古军入掠情形与山西边将的消极御敌,陈述较为典型,条摘如下:

……虏自去年六月十八日进边,至七月二十二日始出,自来留恋内境,未有若是之久;其所残破卫所十余,州县三十有八,西至河泽,溢东掠平定、沁、辽,南入潞安、平阳之境,纵横不营千里,自来蹂躏地方,未有若是之广;广杀掳男女十余万人,抢劫马牛畜产、财物、器械至不

可胜纪,自来被害之惨,未有若是之甚;且虏众虽称数万,其实不过万余,而我士马四集,其众亦且五万。乃诸将望风退缩,择便自藏来避其锋,归镊其后,绝无有敢向虏营发一矢者^[10]卷271,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乙亥。

此段记载中称明代蒙古入掠“未有若是之久”“未有若是之广”,而明军消极防御“未有若是之甚”。明中叶明蒙对抗激烈情势可见一斑。实际上,自嘉靖二年(1523年)一直到隆庆和议前,《明实录》等史籍中有关明代蒙古集众入掠与北边明军被动消极防御的类似记载大量存在,较成规模的入掠活动几乎年年都有,如遇有灾害等情形,入掠次数亦有增加。明朝中后期的局势虽然总体上与明代蒙古处于战和不定状态,但随着明蒙对抗政治形势的变化,内地民人不断北上垦殖,从事生产。明中叶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生活的内地民人大致有三类:山陕受灾边民,大同军乱后的镇卒军民,白莲教徒。

(一)山陕边民逃难避祸迁入是阴山地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初城胜州,一度经营套地,旋从废弃。自是及于清初,仅陕晋细民出没其间,春出秋归,名曰雁行,其迹甚微,盖省境东西千余里,复沦为游牧之区矣。”^[11]《绥远水利沿革》明人谢肇淛则认为,逃避明朝剥削与压迫是山陕边民进入草地生活的重要原因,其称:“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12]另外,因明清小冰期气候变化,明中叶北方地区自然灾害频繁,“饿莩盈涂,不可胜计”^[13]卷256,成化二十年九月己酉。明朝因国力衰颓,无力纾解困苦,山陕边民生活颇为艰辛,因而大多选择进入草地避难谋生,“……但陕西地方军民,述年以来,困于虏变,困于岁加,困于转粟,困于修筑,公私匿竭,巧藏空虚,别难措置。……加以频年兵荒,疮痍未复,卒遇久旱,遂成大饥。闾里萧条,逃之接踵,盗贼间起,剽掠潜行,困敝艰难,莫可名状”^[13]卷256,成化二十年九月己酉。灾害侵袭与明蒙战争冲突频仍,使得山陕等地边民军卒生活困顿,《五原县志》载:“明中叶,蒙古各部复据河套,内地饥民或负罪者,往往潜赴入套,垦田自存。”^[14]

此外,他们还要遭受边官墩将的压迫和租税剥削。这进一步使阴山草地成为山陕边民逃难之地,“故闻边人颇有苦所司之诛求,思虏中之佚乐者”^[8]《上边议八事》,1148。“尝密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

种也,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扰我。”^[15]《大同平叛志》,²⁶⁰山陕边民常因避灾和减轻生活困苦而进入阴山地区谋生,“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枯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独可得活命也”^[16]²⁶⁰。山陕边民生活艰辛,是其北走进入草地生活以避难求生的重要原因。

(二) 社会失序,大同镇不少兵卒逃入阴山地区

明朝中后期,边政堕废与社会失序导致大同军乱爆发,不少镇兵军卒进入阴山地区生活。“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5]《俺答封贡》,⁹¹²大同镇分别于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嘉靖十二年(1533年)十一月两次爆发军乱,不少军卒进入北方草地生活。“(嘉靖——笔者注)三年七月,大同军叛,多走出塞降虏……十三年闰二月,遣大臣赈抚大同,叛者北走从虏几千人。”^[15]《皇明北虏考》,²¹²在嘉靖年间大同军乱事件的催化下,不少边堡墩卒举乱后进入草地生活。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大同镇老营堡游击李应禄家干活的刘四郎“于本年五月内,因李应禄剥削军粮及严行捆打,怨恨,就合谋为不义,倡率见在虏营逆犯陈世贤、王殿等,各又不合听从,持刀杀伤游击,各骑官马,带领见在虏营伊母贺氏、妻陈氏,并各人男妇一百三十余口,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堡丫角山出边,投入俺答部下,发送板升住种”^[15]《赵全藏骸》,¹¹⁴。此为明中叶北边兵卒与将帅发生矛盾后北走进入草地生活的较为典型的事例,而阿拉坦汗也多予以接纳安置并“发送板升住种”。对于明中叶北边军卒成群结队进入草地生活的现象,时人就有认识,如名臣胡宗宪称:“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才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国之赤子也。”^[8]《题为陈思见以裨边务事疏》,²⁸⁰²除了逃避祸乱和官将剥削等原因外,阴山草地上明代蒙古部落的生活风气也具有吸引力,如“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12]云云。又如,“彼中禁网疏阔,征缮甚稀,耕田饱食,岁仅有斗酒罌粟输主者,无它苛焉,故板升之聚数万”^[17]。阴山草地上下同甘苦的风气,对饱受边官镇将欺凌剥削的边民边军北上迁移谋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 白莲教徒进入阴山地区活动

明中叶,吕老祖、赵全等白莲教徒不断招引内

地民人入居阴山草地生活。白莲教缘起于南宋时期,由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在元朝,白莲教进一步发展。明初,朝廷以高压政策禁绝白莲教发展,明中叶,北边军民与白莲教徒多因政治等原因进入阴山地区中部丰州滩生活。“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是时虏酋俺答引众西掠且二年,留部虏千余人于丰州,守其老幼,虏不耐暑,每夏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10]卷486,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 白莲教徒丘富、赵全、李自馨及招引而来的内地民人得到了土默特首领阿拉坦汗的积极接纳,修筑板升定居并从事农作生产。蒙古贵族因气候及生活习惯原因常外避北走,民人与蒙古底层民众长期杂居共处,形成社群,成为明中叶此地半农半牧化发展的重要契机。招引周边地区白莲教徒汇聚于北方草地生活,使白莲教徒成为阴山地区重要的移民来源。“节年抢巧汉人并召集逆叛白莲教人等约一万余名”^[15]《赵全藏骸》,¹¹³“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16]⁴³³聚众而来的白莲教徒与迁移而来的内地民人共同生活于阴山中部南麓的丰州滩地区,营建板升聚居,发展农业手工业,推动土默特的发展,为开发丰州川作出了贡献。“……自是以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16]⁴³³内地军民逃入草地后,也逐渐在日常生活生产中与蒙古族部众杂居融合,嘉靖时期阴山地区推测有汉民逾万人,至隆庆元年(1567年),“中国逃民,散入虏中,如板声地方,聚党成队,动以万计”^[8]《应诏陈言兵务疏》,⁴¹⁷⁴。隆庆和议后,生活在阴山地区的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万历十一年(1583年),兵科给事中王亮条上书称:“板升夷人,众至十万。”^[18]卷141,万历十一年九月甲辰

(四) 明中叶阴山地区的生产发展

随着人口不断迁入,尤其是明中叶阿拉坦汗率土默特部驻牧阴山地区中部的丰州滩,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明嘉靖三十六年,倡修五塔与八大坂升,今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19]至嘉靖中后期,丰州板升地区已经是“虏错而耕牧如棋布”^[15]《北虏始末志》,²⁴。成书于16世纪的巴德利所著《俄国·蒙古·中国》记载,嘉靖四十六年(1567年)时,“蒙古出产各种谷物,如糜黍、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还有多种不知名的作物。当地有洁白

的上等馒头。蒙古地方有瓜果蔬菜,在各种园圃中出产苹果、樱桃、瓜、西瓜、南瓜、黄瓜、葱蒜以及其他各种蔬菜”^[20]。可见,当时板升农业经济除了生产粮食外,还兼种水果蔬菜,丰富了阴山地区农作物种类。较长时期内,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大体上保持发展态势,以致16世纪后期萧大亨感慨:“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15]《北虜风俗》,243}

明中叶,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初步发展之时,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除了蒙古人以畜牧为主外,内地民人在经营农业之余还从事畜牧业。如,因避祸迁入的白莲教徒,“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称是。余各千余人”^{[15]《云中处降录》,80};汉地民众进入阴山地区从事生产之余还保有相当数量的畜牧牛羊,生活在嘉靖万历时期的瞿九思(1545—1615年)称:“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赵——笔者注)全有众万人,骑五万,牛羊称是。自(李自——笔者注)馨及(周——笔者注)元差减,最下者亦千骑。”^{[9]《俺答列传下》,146}赵全属下民众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春夏耕牧,秋冬围猎”^{[15]《云中处降录》,80},是比较典型的半农半牧经济形态。对于部分上层军卒首领及群体头目而言,其所经营的农业与牧业是并行发展的,牧业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综上,明中叶北边军政堕废,官将矛盾尖锐,恰逢水旱灾害与大同军乱等社会动荡事件发生,都成为汉地民众大规模进入土默川平原生活的重要原因。明中叶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生活的内地民人主要包括山陕受灾边民、大同军乱后北边镇卒军民和白莲教徒。虽然进入阴山地区生活的原因各异,但内地民人迁移进入草地生活,一方面增加了阴山地区的活跃人口数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对边疆开发、民族融合与农业生产建设有重要影响。

四、“隆庆和议”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土木之变”后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国势渐衰,对边外蒙古的政策更加趋于保守并转变为一种消极的固守应付政策^[21]。明蒙双方虽仍保有贡市传统,但因双方互不信任,官方贸易关系难以持久。为补充必要的生活所需,蒙古军常南下入边抢夺。但这种长期以战争形式补充物资的做法也影响到了明代蒙古部落的稳定,“而会俺答自入寇归,畜产死,人民疫病,乃且莫恐……而况所凶略,大半又皆

归部曲,甚创艾”^{[9]《俺答列传中》,98}，“节年入抢,为中国害虽大,在虏亦鲜利”^{[10]卷311,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在阿拉坦汗和其他蒙古首领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22],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二十一日,明代蒙古土默特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和其他大小首领接受明廷封号,并沿长城一线设立市口,明蒙双方开展贸易。

(一)互市贸易兴盛

“隆庆和议”使明蒙之间“在政治方面由战乱走向和平,在经济方面由封锁走向沟通”^[22]。明蒙双方在北方地区开展贸易,“广招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缙,岁市马各有数”^{[3]5842}。商贩云集,往来贸易马匹、布帛与粮食,加强了内地与阴山草地的联系。除官市外,明蒙双方还通过“民市”进行贸易。“民市”是由马市后续发展出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方便双方在马市结束之后在另外规定的地点往来交易,商品交易扩大到民间。隆庆五年(1571年),“北虜款贡以来,始立市场……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8]《请罢榷税疏》,4968}。民市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锅釜、针线、增絮、绵帛、米谷、棉花、食盐等物品^{[9]《俺答列传下》,122}。“隆庆和议”后,内地民人进入北方草地的现象似乎并未中断。万历初年,张居正曾在奏疏中称:“近见山西巡按疏中言边人叛入虏中者甚众。”^{[23]《与总督方金湖以奕谕处置边事》}万历四年(1576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沈涵上疏称:内地民人进入阴山板升地区垦种生活“去者接踵”^{[24]《酷暴边关仇视降人疏》}。在和平时期进入阴山地区的内地民人成为阴山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板升出塞,久居夷方,恋其田舍,又文法宽而地土肥,无复中国之念矣”^{[25]《密间谍》}。

(二)农业生产不断发展

“隆庆和议”后,除官方互市贸易发展外,阴山地区也进入了稳定生产时期,“款贡以来,八年于兹……客饷日积于仓廩,禾稼岁登于田野”^{[18]卷79,万历六年九月甲戌}。阿拉坦汗等部在经济上也日益依赖板升农业生产,“虏数万,仰食板升收获”^{[9]《俺答列传下》,124}。随着农作种物的丰富,明代蒙古也开始改变饮食习惯,烹饪豆类粮食,“自板升叛逆播种之后,及款塞以来稍知粒食”^{[26]《虏俗夜谈记》}。马市兴起后又进一步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边地孳牧渐多”^{[8]卷318《条复收胡马疏》,3375},北疆生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发展,“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10]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到万历五年(1577年)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3]《方逢时传》,5846。清初顾祖禹对阴山地区的农业概貌有所描述:“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与中国无异。”^[27]《山西六》

“隆庆和议”无疑是明朝中后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明人焦竑称:“……大抵因贡为市,中国以段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汉财物,交易不绝,诚所谓贸迁有无,胡越一家。故东西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以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数十万石。”^[15]《通贡传》,441 隆庆和议在政治上止消双方兵革,友好往来;在经济上发展商贸,互利互惠;同时也加强了蒙汉民族联系,促成“胡越一家”。隆庆和议后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作物种类增加,规模扩大。虽然明代阴山地区农业有所发展,但限于自然条件等原因,牧业还是占有绝对优势,仍是阴山地区主要的经济生产活动。

阿拉坦汗死后,土默特部因争夺顺义王的继承权而不断分裂,势力渐衰,最终于天聪元年(1627年)被西迁的察哈尔林丹汗所打败,土默特部归附林丹汗统辖。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征伐并攻灭林丹汗。关于后金军队占领土默特部时的社会状况,在《满文原档》中有相关的描述:

(初六日,各处之军)【各处进入之满洲大军,焚毁各处村堡之房舍,糟蹋其粮米,各携所俘人畜财物,来到汗前。金银缎帛,八家均分,又每家分上等牛十头、羊百只。军中有马毙者,偿之以牛马。时新附总兵官麻登云等以及大凌河祖可法等官,自游击以上皆携来从征,各按品级,以人口、牛羊厚赏之。又羊数万,尽犒军士,令宰而食之。【此番所获人畜共计十万余。斩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人】^⑤

战事主要集中于阴山中部地区,农业经济遭受重创。阿拉坦汗时期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至清初,丰州滩农业发展仍较凋敝。

五、结语

有明一代,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阴山地区被明廷与明代蒙古交替控制。明代阴山地区移民的涌入与政治形势变动有密切关系。明初,明蒙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争夺。明前期在阴山地区实行军事卫所制,设卫兴屯,移驻军队,成为明朝内地民人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的重要端始。明中叶,

山陕受灾边民、大同军乱后边军镇卒与白莲教徒等内地民人不断北上进入阴山地区丰州滩等地,进行农业垦殖,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发展。隆庆和议,阴山南部及周边地区商业贸易发展,人员往来频密,有力地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牧业发展。在清代大一统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内地民人自发前往蒙古地区定居并进行农业开垦,阴山地区农耕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农业产区。

明代阴山地区人口的涌入与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大批内地民人迁入阴山地区后,带来了内地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开发,推动了农业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农作物品种的引进种植,为之后阴山地区由半农半牧转为定居农耕创造了历史条件、奠定了现实基础,是明清边疆史、内蒙古地区史和北方民族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明清时期阴山地区外来人口迁移与农业化过程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期盼学界同仁予以更多关注,提出更多见解,开展更加精深的专题研究。

注释:

①参见:陈永升《板升与俺答汗时期土默川地区的开发》,载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唐玉萍《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探论》,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刘雄峰《明代白莲教与漠北边事》,载于《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许慧君《明代板升的社会效应与历史影响》,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刘春玲《明代后期俺答汗对土默特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载于《阴山学刊》2012年第4期;赵发《阿勒坦(俺答)开发丰州的策略逻辑》,载于《西部蒙古论坛》2019年第2期;等。

②华力西运动(Variscian movement)是发生在古生代晚期的地壳运动的总称。这次运动使得古生代晚期及其以前的地层发生褶皱、变质和断裂等。天山、阿尔泰山等都是这次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山系。由华力西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带被称为“华力西褶皱带”。与华力西运动完全相同的海西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带被称为“海西褶皱带”。(参见封吉昌主编《国土资源实用词典》,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84页)

③燕山运动(Yanshanian movement)是中生代整个侏罗纪和白垩纪期间广泛发育于中国全境的重要构造运动。1927年,由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准地区而创名。燕山运动主要表现为褶皱断裂变动、岩浆喷发侵入活动及部分地带的变质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燕山运动的强度与表现形式有着明显差别,如就中国东部以至整个西太平洋带来说,燕山期的构造变动与岩浆活动有着愈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强烈的演变规律。燕山期为中国重要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也是中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

与改造期。经长期深入研究证明,燕山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乃至部分特提斯带等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燕山运动应属洲际性的重要构造运动。(参见徐世芳、李博主编《地震学辞典》,地震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

④也有学者以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北元即告灭亡为断限,将明代蒙古史称为北元-蒙古史。

⑤转引自齐木德道尔吉《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二):以〈满文原档〉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王景泽.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8-53.
- [2]张兰生,方修琦,任国玉,索秀芬.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J].地学前缘,1997(Z1):127-136.
- [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明太祖实录[Z].台北:史语所,1962.
-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第15卷[M].台北:史语所,1979:679.
- [7]李东阳,等.大明会典:第110卷[M].扬州:广陵书社,2007:198.
- [8]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
- [9]瞿九思.万历武功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0]明世宗实录[Z].台北:史语所,1962.
- [11]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588.
- [12]谢肇淛.五杂俎[M].傅成,校点.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4.

- [13]明宪宗实录[Z].台北:史语所,1962.
- [14]《五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五原县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64.
- [15]薄音湖,王雄,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 [16]唐景绅,谢玉傑,点校.杨一清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7]熊明遇.绿雪楼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07.
- [18]明神宗实录[Z].台北:史语所,1969.
- [19]佚名.阿勒坦汗传[M].珠荣嘎,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52.
- [20]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M].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51.
- [21]于默颖.“土木之变”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94-99.
- [22]晓克.“隆庆和议”新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6):78-81.
- [23]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43.
- [24]张鹗,辑.皇明嘉隆疏抄[M].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266.
- [25]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82.
- [26]王同轨.耳谈类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0.
- [27]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2006.

【责任编辑 马毓】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Yinshan Area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s

LIU Xiao-d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sta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Yinshan area.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military garrison system was implemented in Yinshan area and villages were set up,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beginning for inland people to enter Yinshan area in Ming Dynasty.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Shanxi-Shaanxi border residents, border town soldiers and White Lotus religion followers and other inland people kept entering Fengzhoutan and other places in Yinshan area for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which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Yinshan area. After the peace talks and tributary trade of Longq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Yinshan area developed further.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Yinshan area in M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flux of immigrants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Yinshan area. The expans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inshan area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Yinshan area.

Key words: Yinshan area; population migrati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ing Dynasty

【英文编辑 郭咏梅】